

■新作聚焦

温燕霞长篇小说《磷火》:

一个民族的“秘史”与“心灵史”

□王干

《磷火》具有强烈的精神向度、丰沛的想象与最为酷烈的战场惨状,构成了极强的审美冲击力。

小说通过对一代英雄个人史、心灵史的呈现,表达了生命的渺小,精神的伟岸。怀着悲悯和反战的情绪,塑造了从神坛走下来的英雄形象,把英雄打造为精神高尚、伦理正义的化身。

美特征,与最为酷烈的战场惨状的写实主义还原,构成极强的审美冲击力——这如同李白与杜甫的一次诗学牵手。温燕霞有可能受到了帕慕克创作《我的名字叫红》的启发,她在这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结合点。作品呈现出中国百姓之所以离开家园,远赴海外浴血参战的深层精神伦理动机:爱家必须爱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小说既体现了当初华人的爱国情操,也体现了作家站在当下的反战情绪。因而,温燕霞在开头写了一个战死他乡的“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我们不得不承认,温燕霞为《磷火》找到了一个恰切的叙事视角。

在小说的各种形式中,结构被认为是最容易传达作品意义的一种形式。《磷火》故事的主体由前4个章节平行构成,分别写摄影家、女护士、兽医、南阳司机的人生际遇,写他们如何从国内、国外的家中辗转来到缅甸战场,写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战事,最后如何牺牲。共同的参战动机,读者早已知悉的死亡结局,可以说,没有秘密。印度女作家洛伊曾对“伟大的故事”加以描述:“伟大故事的秘密就在于没有秘密……你知道它的结局,然而当你聆听时,你仿佛并不知道。”《磷火》4次重复“没有秘密的秘密”,只为表现他们内心一致的“精神伦理秩序”。

战争能摧毁一切:捣毁政体、碾碎家庭、摧毁肉体,甚至包括摧毁人的精神……但温燕霞却在战争中寻找秩序,为大写的“人”建立精神伦理秩序,显示了作家作为人类灵魂工作者的庄严。人类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与暴力手段,就是战争。战争的走向涉及到每一个战士的命运,抽象地关乎正义与邪恶的胜负——但一切并不以个人好恶为转移。小说中最为极端的情境,除了地震、海啸等天灾,无疑也就是战场——再也没有比战争更为恶劣的人祸。战争题材的作品之所以吸引读者,在于它最大限度地表现了人在极端环境中的物理状态、精神状况、身心承受摧残的极限。正因此,战争题材的小说最能反映人类的面貌,战争题材是极能考验作家才能的大题材。

温燕霞是一个经受了大题材考验的作家。《磷火》写的是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的经历。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命运,其意义自不必说,而书写这段历史的纪念意义也不

言自明。小说家处理这个题材,如果仅仅表现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使小说成为历史教科书,显然是不够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且也仅仅只能是“秘史”。小说的根本属性永远是虚构,表现的是心灵的真实。战争在温燕霞的小说中是人物的极端生存困境,是一个巨大的困局——战争在小说艺术中的功能就是这样。温燕霞认识到了战争在小说中的功能,知道战争在现实中的历史意义,这才能使小说恰如其分地成为“民族的秘史”,成为活灵活现的“心灵史”。

战争机器碾碎了无数人的幸福生活,激起的是人对正常世界秩序的心灵渴望。亡灵们回望自己早年的家庭生活,摄影师水中救人的人性闪光,女护士的爱情升华为一种献祭情怀,不同民族的战士之间的友谊都是美好的回忆……而那些追逐着他们的极限恐惧、背叛、陷阱,以及女护士饮用尸水后本能的恶心、反胃……这些都是战争留给他们们的无边梦魇。战争把敌人变成了魔鬼,也把自己变成了亡灵——这更能确立正义的价值,确立高尚灵魂的价值,确立精神伦理秩序的价值。战争中的世界畸形、变态、慌乱、混乱不堪,等待每一个人的是死亡,毫无悬念的死亡。

缅甸战场的远征军战士,无疑是民族的英雄。在国家危亡关头,他们在一场正义的战争中英勇献身。然而,海明威却说:“战争是一场灾难,一个名副其实的屠宰场。”海明威参加过战争,深受其害,因而写了《永别了,武器》,表达他的反战情绪。海明威借主人公之口说:“每当我听到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一说法,总觉得局促不安。我观察了好久,可没看到什么神圣的事,而那些所谓光荣的事,并没有什么光荣;而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说:“几乎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海明威对美国人民的感情和态度产生过更大的影响。”

温燕霞通过对一代英雄个人史、心灵史的呈现,表达了生命的渺小、精神的伟岸,投军的热情、战争的惨烈和亡灵盼归国的70年漫长等待。作品高扬人道主义精神,怀着悲悯和反战情绪,塑造了从神坛走下来的,



具有人的弱小的英雄形象,塑造了从“人”到“魂”的不灭爱国情怀,把英雄打造为精神高尚、伦理正义的化身。作品中以浪漫主义方式处理的亡灵的归乡渴望,颇似浪漫主义爱国诗人屈原悼念和颂赞为国而死的将士的《国殇》以及振聋发聩的《九问》:“问天何寿?问地何极?人生几何?生何欢?老何惧?死何苦?情为何物?人世何苦?苍生何辜?”战争是人类的极端困局,是时不时的上演的巨大悲剧。反对战争、热爱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梦想。在混乱的战争时期,更能看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而一个和平时期的国家,对沙场战死将士的态度,也更能体现出精神伦理的秩序是否得到了大范围的维护。温燕霞歌颂英雄,反对战争,这也正是对精神伦理秩序的一次维护。现实中的状况和小说中一样,我们欣喜地看到,远征军将士的遗骨已经分批从海外战场接回祖国。英雄们的遗骨安葬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接受全民公祭。

愿英雄安息!



■创作谈

《磷火》写的是一群中国远征军中的小人物,美国照相兵的英文翻译、运输队里的兽医、战地医疗点的护士、滇缅公路上冒死穿行的南洋机工,他们的人生平凡得如同被洪水裹挟的一颗颗鹅卵石,在时代的浪潮中翻滚、逐流,最终被战火吞噬。他们个体生命熄灭时的磷火微不足道,可当他们以群像的方式出现时,零星的磷火仿佛万千萤火飞进了纱囊,发出的光芒足以洞穿70年厚厚的时光尘埃,那一瞬,我看见了他们一颗颗火热的爱国之心。

2013年除夕,独坐书房的我,一颗心似坠落的陨石,撞向了70年前的那段铁血岁月。当我再次注目手中那本题为《国家记忆》的书时,无法抑制的热泪如同暴雨,迅猛地击打着我的脸颊。那一刻,除了感动之外,我内心充满羞耻——一个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居然从未在课堂上听过有关中国远征军的片言只语,虽然后来通过各种媒介渠道知道了他们的热血故事,但那些苍白的语言又怎能敌过这些现代科技留下的真实影像呢?与此伴生的,还有深深的疑虑。照片中的青年士兵面容清瘦、衣着简朴、穿着磨得破旧的草鞋,稚嫩的脸庞坚毅毅弘。这是红军还是白军?在我的记忆中,蒋匪帮是万恶不赦的敌人,尤其是苏区时期,在我的老家赣南,他们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不用任何强迫或暗示,我早已将他们脸谱化了。然而,面对这些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青年战士,丑陋的白军脸谱倏地破碎了,取而代之的是“国军”这一概念——他们是值得我们铭记的国军战士。为了抗击外侮,他们出征异国,在陌生的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独立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成为飘浮在异国他乡的点点磷火。

于是,我决心拿起手中的笔,为那些无名战士树碑、招魂。他们是谁?他们有着怎样的过往,怎样的喜怒哀乐与爱恨情仇?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脑子里会掠过怎样的想法?他们死后尸骨沉埋在南国葳蕤的植被里会否觉得逼仄?如果真的有灵魂,当他们看到战后日本人为战死在缅甸的士兵建起镇魂塔,而他们却因无人收尸、祭祀化为磷火游荡在遮天蔽日的丛林中时,他们将作何感想?这些问题仿佛一根根银针刺入我的脑海,我一头扎进书堆,希冀从中巧遇几位远征军战士。然而,我看见的大多是对战役、战将的记载,对于普通士兵的记录少之又少。所幸的是,近年来有些远征军老兵写了回忆录,我从他们的絮语中得到一窥那些普通士兵当时的生存状况与心境。鉴于当时十万青年十万军的情况,我笔下的他们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军人,各行各业,有着不同的身世和爱恨。他们来自于尘土最后归于尘土,所不同的是,当他们的青春和生命消逝时,我笔尖上忽然绽开了几朵蓝绿色的鲜花。这些花朵会飞翔、能说话,它们在林间明灭时并不恐怖,而是充满凄美、奇异的美感。

由于史料稀少,我笔下的年轻人生长得非常缓慢。我必须用想象喂养他们,通过构造细节来制造他们的血肉,这样,他们的灵魂才有所附丽、有所归属。当他们的躯体消融在烈焰中时,我倏地看清了他们的眉目,同时也听到了属于他们的呼吸、心跳和脉动。那一刻,我听见笔尖在说话:他们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汉子了,该告诉大家有关他们的身世和情感故事了。

三年的业余时间,我终于描出了他们的五官、躯体和心灵,还有他们见风就长的万丈豪情。我希望读者能从他们身上看到比磷火更为耀目和温暖的光芒,那是属于同胞、属于勇士、属于烈士、属于无名英雄的光芒。

以笔为证

□温燕霞

■新作快评

肖复兴中篇小说《丁香结》

《上海文学》2015年第6期

大杂院里的丁香情

□赵振杰

肖复兴的小说具有“形散神聚”的散文风格。他的中篇小说《丁香结》在保持抒情特质的同时,叙事技巧和思想内蕴也更加炉火纯青。小说以丁香树的成长为经,以连氏家庭种种变故为纬,通过多视角转换、双时态并置、预叙、闪回、时空交错、蒙太奇、意识流等叙事方式,立体地、生动地、艺术地还原了北京大杂院里横跨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故事。其语言唯美清丽,节奏跌宕绵延,情感饱满真挚,充满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忧伤感与沧桑感。

就故事本身而言,小说大致可分为“文革”前、中、后3个时期:“文革”前,连氏大杂院内先后发生了连先生续弦、连姐儿高考失利、连先生过世、小连太太当家、丁师傅入住等事件;“文革”中,连家经历了红卫兵抄家、丁师傅下放、小连太太惨死等变故;“文革”后,大杂院里的丁香树又见证了连姐儿的婚礼和葬礼,以及“我”与中学女友的久别重逢……作者巧妙地通过大杂院的“变”与丁香树的“不变”清晰地呈现出个体命运被那个荒唐时代漩涡所裹挟、吞噬的全过程。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针对大杂院里的连家故事,肖复兴分别选取了儿童、青年、老人3个视角来展开叙述,从少不更事的“我听说”到父子通信中的“我猜测”再到断壁残垣下的“我回忆”,小说的情感基调逐渐由“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天真烂漫,变为经历过“城头变幻大王旗”后的稳重与深沉,进而变成“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洒脱与从容。小说的思想内蕴也随之不断丰富和深化:其中有对童年往事的追忆,有对血色青春的祭奠,也有对现代化进程的隐忧——正如“我”在文中所言,曾经是个体被命运裹挟的时代,而如今是历史被现实强拆的时代……世事沧桑、人生况味,变化得都那样的快。过去与现在彼此交错在一起、厮缠在一起,却又拉开了无法缩短的距离。

肖复兴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颇具匠心。无论是人物群像还是典型形象,他都刻画得游刃有余、栩栩如生,例如,通过连先生的言谈举止来衬托其内敛深沉的性格;通过生动传神的心理描写和动作描写来烘托丁师傅的憨厚、善良与正直;通过嚼舌头、传八卦、看热闹等情节来呈现大杂院街坊四邻们的市俗气息;通过生火、做饭、找对象等事件来揭示连姐儿由“饭来张口”到自力更生的蜕变过程……其中,作者对小连太太形象的塑造最为出色;小说先是以“我”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开始,随后又通过悬念、留白等方式引发读者对其身世和情感的种种猜测,最后以一种“欲盖弥彰”的手法——从派出所户籍簿上得知其真名叫连丁香——揭示出小连太太与连家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亦或是血缘)联系。在作者“欲说还休”的讲述中,小连太太谜一样地出场,又谜一样地消逝,最终成为了一个孕育无限可能却又无法解开的疑惑。

《丁香结》在叙事风格上也别具一格。作者采用追忆散文式的笔法来讲述故事,通过过去与现在自由跳转的方式,为小说文本建构了一个回环往复的“叙事圈”,这种既开放又闭合的叙事结构为读者带来了一种“曾经沧海”与“昨日重现”相融合的迷离感与梦幻感。其次,肖复兴还深谙“以物喻人,动静结合”的写作之道,小说中明线写连家人,暗线写丁香树,两者一动一静,以静衬动,顿生黍离之悲,以树喻人,更觉世事沧桑,加之文本中动静结合的意识流情节和蒙太奇片段,更加使得小说的情感基调复杂而饱满,纯粹而富有变化性。

■短评

当代诗歌的守望者

——吴思敬《中国当代诗人论》读后

□王永

在诗歌面前,吴思敬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屡屡提及,诗歌与青春相连,与梦想相连,在新著《中国当代诗人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中,他始终关注诗歌的场域,从未离开诗歌的现场。

诗歌批评是一项独立的事业,它并不是诗歌写作的附庸和次产品。在这部著作的“后记”里,吴思敬引用了陆游的诗句“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表达了数十年来从事诗歌批评的体会。吴思敬对于诗歌评论、诗学研究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多次表达过,诗歌是寂寞的事业,诗歌批评是更加寂寞的,但是他愿意坚定地做诗歌批评的守望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元好问的这句诗本是用来形容男女间的痴情的,陈文超的长篇小说《痴人街》却对这句诗作了新的解读。小说中的“痴”并非古今中外爱情小说中的痴男怨女,而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片“痴”情。

小说中,李旺火牵挂一对儿女,死了20年也不肯投胎转世,希望自己能够在阴间保佑子女一生一世。做了鬼不时溜回故乡月亮镇,痴呆女晓晓的表现更常常让他肝肠寸断。同样挂念着6个女儿的何长贵一死就急急匆匆地喝下孟婆汤,因为他认为阳间的人被阴间的亲人惦念得越深,他就越倒霉。他活着时对朋友李阿宝的一段话道出了他内心的纠结:“当年,我外婆死了,她最喜欢的、最忘不掉

的是她的大儿子——我的大舅,可我外婆死后还不到半年,我大舅就因心肌梗塞而跟她走了。8年后,我外公死了,他最爱的是他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母亲,结果,他死后刚好一年,我母亲突然因脑出血也走了。”“痴”的表现方式虽然不同,但殊途同归,体现的都是父母对子女的无私奉献和关爱。

小说的笔墨游走于阴阳两界,不但是死去的鬼,活着的父母对子女的“痴”岂有两样?铁匠孙万三为了将手艺传给5个儿子,从铁业社辞职开了一家打铁店,从而丢了劳保,晚景十分凄凉。但他无怨无悔,依然为当年的“英明决策”沾沾自喜,张得宝为了那个私生疯女,瘫痪后死活不肯卖掉破房子进福利院;秦寡妇为了给遗孤

验证。《中国当代诗人论》所论涉的诗人甚夥,分别为“归来的诗人”、“朦胧诗人”、“中生代诗人”、“女性诗人”、“西部诗人”、“少数民族诗人”等专著。对于“归来的诗人”,吴思敬立足于“重评”,即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从“知识考古学”的立场揭去覆盖在这些诗人身上的标签。尤其是对于邵燕祥、郑敏、牛汉、彭燕郊、辛笛的专论,都沉实有力、独具慧眼。比如,他对现代文学史所忽略的邵燕祥上世纪40年代后期诗歌的关注和研究,为邵燕祥后来诗歌创作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点。他对彭燕郊的研究并没有囿于文学史关于“七月派”的评判,而是放在了20世纪诗歌发

展的大背景之下,论述了彭燕郊对于中国诗坛的独特贡献。这些翔实的论述既深化了对于诗人的研究,也丰厚了诗歌史的研究。

另外专辑中所论的诗人大都是青年诗人,或者是“当时的青年诗人”。关注青年诗人,一直是吴思敬写评论的初衷和着眼点。相对于“锦上添花”的评论,一位有作为有责任的批评家更应该做的是“雪中送炭”和“点石成金”。

古人讲,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吴思敬从事诗歌评论30余年,有着深厚的学养、广博的视野和精准的眼光,他的诗歌批评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在他的文章中,我们读不到艰深的“行话”、晦涩的术语,他对于西方和中国古典的诗学资源总能信手拈来,在评论中综合着诗歌文本的细读和诗歌史的整体把握。同时,他几乎与所论诗人都有着或密或疏的过从,因此能够“知人论世”,给诗人一个更加全面的评判。

人生自古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俞胜

弄个非农户口,自己身败名裂,人不人不鬼。这些“情痴”虽小说不同,身份、处境、地位各异,但小说均以“痴”渗透其精髓,显得感人至深。《痴人街》具有丰厚的思想内蕴。小说在铺排父母对子女“痴情”的同时,力透纸背地写出了那个年代“户口制度”对农村和农民的束缚。正是自身拥有“非农户口”,丑陋且身有残疾的李阿宝才能娶上如花似玉的农村姑娘赵鑫花。赵鑫花因此不得不和真心相爱的分手,她的爱情悲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何长贵的6个漂亮女儿都是农村户口,却从小住在镇街上,因为不会干农活而受尽羞辱。何长贵的小女儿姗姗嫁给了赌棍却也遭人嫉妒,正因为赌棍有个“非农户口”。秦寡妇的遭遇更让人

唏嘘不已。小说发出了那个年代农民受苦、受穷、受歧视的哀叹,具有反思批判的色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二元户籍”藩篱的打破,农民生活、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何长贵的5个农民女婿凭借一门手艺闯荡江湖,各自勤劳致富。原本贫困的立新村也因土地升值而成了城里人向往的乐土。小说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新时期农村风貌的窗口。在创作手法上,《痴人街》虽然使用了一些魔幻手法,但总体仍以现实主义为主。魔幻手法拓展了叙述视角,李阿宝游走于阴阳两界,他的所思所忆、所见所闻将本来松散的、跨度达几十年的故事融为一体。给读者带来别样的阅读体验。